風物 深度

香港新生代導演通宵大對談:我們自己,定義我們的年代

我們之間有競爭?其實不是!是我們真是忍了這些老人太久,不用靠你們那一套,我們自己定義我們這一套。



香港年輕導演: 曾憲寧、賈勝楓、何爵天、卓亦謙、林森與劉國瑞。攝:林振東/端傳媒

特約撰稿人 紅眼 發自香港;錄音整理 馬碧玉 | 2023-04-14

香港電影

再過五年、十年,會見到一些不同,有些人會妥協,有些人會走,繼續對抗 這個系統。但只要我們記得今晚,或你最初的那個模樣……」

【編者按】去年下半年開始,香港電影在疫情解封後一掃陰霾,湧現票房佳績小陽春。其間當然有識途老馬賣力新

作,卻也有批新導演,試圖走出新路。本週日,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即將舉辦頒獎禮。香港電影金像獎向由不同

代際香港電影人參與構成,也是新血老驥相爭場域。但更重要的,是在金像獎外——社運退潮數年間,「香港電

影」屢屢成為香港變幻晴雨表,其與日益嚴格的審查之關係,與合拍片之未卜前景,都令它承受了多於電影本身的

目光。年輕一代導演恰在此時出道,又對前途作何觀想?

借金像獎揭盅前夕,大眾目光聚焦香港電影之時,我們齊聚六位香港新導演,把酒通宵,談論今日及未來的香港電

影。今次半私密,亦是半公開,有花生,有義氣,更有酒後真言,香港新生代眾導演之今夜不設防對談實錄在此,

以饗讀者諸君。

如果說《七人樂隊》是上一代香港電影名導細數當年情的一次聯誼,那麽2022年包括《正義迴廊》、《窄

路微塵》、《白日青春》、《燈火闌珊》等剛好片名都是四個字的本地作品,應該就是幾名年輕新導演的

一次即場合奏。他們有不同學院派系出身,亦有半途轉投電影工業,據聞手機裡卻有個「四字導演」群

組,在謝票場盛行的今日,有時會相約去隔壁院廳「探班」一起出席映後活動,甚至試過總動員一起謝

票。

不過,要約齊他們殊不容易。何爵天、曾憲寧和劉國瑞正忙著四出巡迴謝票之際,林森剛從英國回來,而

賈勝楓則帶著《流水落花》到芝加哥影展走了一趟,卓亦謙則埋首為《年少日記》剪接後製。風塵僕僕,

難得一聚,這夜看著他們摸住杯底談電影,像是一個昏燈而喧騰的長鏡頭,爭辯乾杯,拍檯笑罵,亂舉中

指,什麼都有。如果以為這是一場金像獎前哨的訪談,將會非常失望。對他們來說,獎項與名次都只是上

一代香港電影的傳統遊戲。

晦暗不明的社會狀況之中,他們展現了不甘平凡的電影創作精神。面對將來的電影之路,特別是下一部作

品的落腳點,他們有時同聲同氣,不分軒輊;但其實身世不同,各有籌謀。他們在這充滿變幻的一年相

遇,時代把他們約在一起,然後又分道揚鑣。

——召集人:紅眼

以下為對談實錄

端:紅眼

林:林森,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導演系,執導作品《窄路微塵》獲選「mm2 新晉導演計劃」。

何:何爵天,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電視電影學院導演系,執導作品《正義迴廊》、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。

劉:劉國瑞,定居於香港的馬來西亞導演及編劇,執導作品《白日青春》獲選第二屆亞洲電影投資會「電影培訓計劃」。

賈:賈勝楓,曾為文化版記者,執導作品《流水落花》獲選第六屆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」專業組。

曾:曾憲寧,畢業於巴黎索邦大學電影系,執導作品《燈火闌珊》獲選第五屆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」專業 組。

卓:卓亦謙,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,執導作品《年少日記》獲選第五屆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」大專組。

PART 1: 導演夢幾時開始?

卓亦謙未來,暫時五位導演。威士忌開樽,好酒,未加冰,免得浪費。

端:曾經有什麼電影作品刺激到你們想成為導演?

賈:我並不是很早就沉迷電影,第一個刺激到我的是奇斯洛夫斯基,那時已是大學時代,開始追看如《十戒》、《藍白紅》、《兩生花》等經典電影,一些講政治的作品,發現電影原來可以有另一個角度,這麼 認真去講一些生命上的重要課題,不只是娛樂或感官刺激。

劉:那現在就很適合在香港拍一些東歐風格的電影(奇斯洛夫斯基是波蘭導演)。如何在紅線底下做創作,還不是東歐?伊朗電影就太直接了。

林:伊朗面對的情況再嚴峻一點。

劉:昔日的東歐還是有理念框架和紅線可以摸到,畢竟蘇聯才是老大哥,東歐不會直接鎮壓你,但伊朗 會。東歐表面上還有理想主義在裡面,同時又要抑制你。

賈勝楓:「大學時代開始追看如《十戒》、《藍白紅》、《兩生花》等經典電影,發現電影原來可以有另一個角度,認真去講一些生命上的重要課題,不只是娛樂或感官刺激。」

賈:奇斯洛夫斯基當時都拍過很多紀錄片,甚至拍攝別人如何上庭,但我覺得,七十年代本身亦相對開放 一點。

劉:只是開始了布拉格之春,蘇聯就直接過去鎮壓你了。至於我,就很簡單,是楊德昌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。從馬來西亞來到香港之後,讀了三年 Business School,然後在中大做教學助理,那年就有時間在圖書館看很多電影,包括剛才說的奇斯洛夫斯基,周圍上很多電影課程,但從沒試過像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那麼直接擊倒我。四個小時,還是盜版 VCD 質素,連角色的樣子都看不清楚,但看完之後說不出話。

某程度上,它說出了我對世界的看法。電影建構出來的世界,正正就是我感受到的世界。當時,我正在拍一些很初級的紀錄片,但都算是有機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實踐這一件事(電影)。後來再一步步從拍電視廣告的副導演,到編劇,然後再到導演,就是將自己感受到的世界用電影表達出來。

曾:好像不同時段就會喜歡不同的導演,例如喜歡過北野武。我也找不到最影響自己到底是哪一位,如果說經歷,可能是去法國交流時,放學後經常會去一間電影資料文化館,幾乎是把自己困在那裡,看了很多 Eric Rohmer、Truffaut、Godard 的舊電影。法國電影之所以好看,是它本身就像法國人的生活,是一場一場的對話。那個階段,我亦很迷戀 Godard 電影裡很多會跳躍的東西,直到現在也覺得前衛。

劉:《燈火闌珊》裡面是否就有一首法文歌?

曾:是,我是很喜歡法國的歌舞,特別是帶有奇怪感覺的歌舞。 劉:那首歌是買的嗎?

曾:我自己寫的。因為我們窮嘛,所以買不到。 何:也是乘機做一些自己喜歡的電影元素。

曾:我是想懷舊的,原本是要找一首在香港 1979 年流行的音樂,應該是 Grease (《油脂》) 那種。但我自己不太有共鳴,所以便找回法國 60 年代的歌曲,但又買不起,所以便用那一類風格,監製作曲,我自己填詞。最後跳舞的動作,是我觀察到霓虹燈師傅如何做霓虹燈,覺得動作有點像舞步,所以再請麥秋成來編舞,我自己幾喜歡。

林森:「我會想到方育平的《半邊人》,故事女主角是賣魚的,我父親就是在街市賣魚、斬魚。那一代賣魚就賣魚,沒想過其他理想的東西,但父親因賣魚提供到一個環境讓我去想自己要做什麼。」

林:我會想到方育平的《半邊人》。會有這麼大的感覺,是因為故事女主角阿瑩是賣魚的,我家就是賣魚

的。所以我小時候看很有感觸。我父親在街市賣魚、斬魚,然後看到一部電影說她同樣是賣魚的,但有一些理想去實踐,想嘗試做戲劇創作,就深深打動了我。

我不是賣魚的那個,我父親才是,但我父親那一代是真的很純粹,他賣魚就賣魚,他純粹是講生計,沒想過其他理想的東西,但因為我父親賣魚,所以他提供到一個環境讓我去想自己要做什麼,而我也是,那時看到這部電影時就覺得,我也對電影很有興趣,我要去追求一些東西。對《半邊人》會有如此大的情感,是因為自己都投射了很多覺得很想做到的事在裡面。

何:那你後來有沒有找阿瑩(《半邊人》的女主角許素瑩)拍電影?

林:我就是無囉。每次見到她本人都會想起《半邊人》,但我是個害羞的男孩,她對我來說是個不可以高攀的偶像。一來《半邊人》的故事跟我家庭背景有點相似,二來是方育平擅長的電影手法,那個質感都比較跟我相近,我是中學時看到,就很喜歡,很想自己將來拍到這種電影。但是又很有趣,反而我在現實中第一個接觸到的人是鄭志豪,即是戲裡飾演阿瑩男朋友的人。當時他在港台做攝影師,也在創辦一個拍本地社運紀錄片的機構,叫錄影力量。

何爵天:「Anthony Hopkins 只出場 19 分鐘,但我已永遠記得他的形象。原來電影的表演是可以這麼 powerful。小時看《侏羅紀公園》只是記住那隻恐龍;但《沉默的羔羊》令我記住演員,記住什麼是演戲。」

何:我也很喜歡《半邊人》,如果要投一部最喜歡的香港電影,我應該也是《半邊人》。但我說另外一部吧。中學時已開始想拍電影,但我很大路,不是因為奇斯洛夫斯基,而是《沉默的羔羊》。《沉默的羔羊》對我的影響原來挺大,最重要是 Anthony Hopkins 戲中演出好似瀰漫著整個作品,我被一個演員真正震攝了。

當然,整部電影的拍攝手法都很出色,後來重複看了無數遍,甚至研究過 Anthony Hopkins 其實只出場 19 分鐘,但我已經永遠記得他的形象。原來電影的表演是可以這麼 powerful,這麼入心難忘。小時候看《侏羅紀公園》只是記住那隻恐龍、那些角色,但《沉默的羔羊》令我記住演員,記住什麼是演戲。

賈:其實《沉默的羔羊》的導演是誰?

何:叫 Jonathan Demme。導演不是很厲害,其實直到他過身之前都沒太多出名的作品,數來數去都是《沉默的羔羊》。但這部作品很厲害,裡面也運用了很多小技巧,你經常會被它的平行剪接騙倒,那些tricky 的設計挺好玩。

端:從《正義迴廊》到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,你的電影也確實有很多影迷成分,會特意將自己喜歡的電影 元素放了進去?

何:就是不自覺、潛意識受到它的影響。所以經常都有人問我的電影裡為什麼會有昆蟲,哈哈哈。可能都是因為這樣,我會想拍一些懸疑推理、殺人的戲。

林:你這樣說很有趣,即是《沉默的羔羊》創造了一種戲裡面有,戲外都有的氛圍,大家會一想起就是那種狀態,很 symbolic 的東西。

林森:「但其實那些老師都無撚用的。」何爵天:「麻煩這句一定要替我們寫谁訪問。」

端:組成「四字導演」群組之前,你們是否已經認識對方呢?從何時開始認識?

劉: 嗱,這個字頭無註冊的,所以不要亂說,哈哈。 林:我和他(何爵天)肯定是認識的。

賈:他們本身就在 APA (香港演藝學院) 認識,我反而是跟大家最不熟悉。

劉:他們有些就是「首部劇情片」的導演,我(《白日青春》)不是。

林:我(《窄路微塵》)也不是「首部劇情片」。

劉:或者分幾種,APA、Creative Media(城大創意媒體)和 BU (浸大) 是三個最多學生的電影學校, 他們就統稱學院派,我覺得學院派永遠有個好處,就是有指導老師帶住。

林:但其實那些老師都無撚用的,屌。 何:麻煩這句一定要替我們寫落訪問。

劉:我不是讀電影,我讀 Business,我和她(曾憲寧)是寫電視劇認識。 曾:我是讀文化研究。

劉:早年她接很多不同的 Project,有次她找阿平(即《正義迴廊》編劇之一葉偉平)寫劇本,阿平再介紹我,而我是跟阿平一起拍紀錄片而認識。

何:我和阿卓(卓亦謙)是《激戰》時認識的。

林:我認識阿卓是因為他的同學,我認識小野(盧鎮業)很久了,Mani(《窄路微塵》監製文佩卿)都 是。

劉:他們 CM 是很大班人的,那個年代還有黃進、黃飛鵬。所以經常會在 IFVA、華語紀錄片節看到他們的作品。我自己就很遲才開始拍我的第一部作品,因為我是 2015 年到 25 歲才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資格,那一年就即刻申請鮮浪潮,然後 26 歲拿到,出道時已經 27 歲。

賈:如果我 34 歲才拍呢?我也是學院派,但我是讀 Chemistry 的,哈哈。所以他們幾個 bonding 會強一點,因為他們可能合作過,但我一直都是較單丁,因為我以前是做雜誌的。是 2019 年時才開始拍短片,參加鮮浪潮。

劉:我是 2017 年,跟李駿碩、任俠同一屆。但你老婆是做編劇的,對嗎?

賈:沒錯,她是編劇,對我都有很大影響,要不是她叫我參賽,我本身都不知道有鮮浪潮這一回事,也不 覺得自己有資格參與,那時是已經快要超齡,再不報下一屆就沒機會報名,所以就想著試一試。

賈勝楓:「我最享受在拍攝現場,那種壓過來讓你好像別無選擇,但又迫出某種可能性。我覺得現場是最困難、最辛苦,但也是有最火花出現的時刻。」

端:離開傳統文字工作之後,電影導演將會是你的第二人生嗎?

賈:即使是現在,原來我已經拍了一部電影了?想到這裡,也會覺得導演身份有點不太屬於我。因為我做了十多年文字記者,影像一直離我很遠。確實會很喜歡看書、看電影、聽歌,但不會覺得自己有能力去拍攝一部電影,又好似冥冥之中有一些東西有推動著我。可能我一早都很喜歡電影,到現在就有些一發不可收拾,很想繼續拍,繼續拍,而且要一邊拍一邊學習。

劉:那你最享受拍電影哪一個部分?

賈:我最享受在拍攝現場,那種壓過來讓你好像別無選擇,但又迫出某種可能性。我覺得現場是最困難、 最辛苦,但也是有最火花出現的時刻。



香港年輕導演們。攝:林振東/端傳媒

PART 2:影壇前輩難相處嗎?

卓亦謙剛到,六導齊聚。杯中泰斯卡,煙燻味濃烈。但有人飲得不夠多。

曾憲寧:「有一晚我與張姐(張艾嘉)message,她回應:你放心吧,我的 崗位就是演員。她很清楚這個界線,知道你不想被干涉,所以有時她會提出 想法,但劃好界線,然後退回一步。」

端:如今幾乎每部新導演作品都會搭配一些影帝影后級的資深演員,影壇前輩難相處嗎?

曾:準備拍攝之前張姐(張艾嘉)有就劇本給出一些意見,她的角色,原型是來自我訪問過的一位喪偶女士,自從丈夫死了之後,她每一日都會拿著午飯去墳前吃飯,對於逝去的愛人有份執著。現在也有保留了這種質感,但張姐就覺得,她以往已經演過很多相似的女性,身邊什麼人都死過,死兒子、死老公、死阿媽,問為什麼我這麼多電影都是死死死,她想找一個較為不同的方式。所以,她會加了些靈巧和活潑在角

色身上,跟我本來寫的劇本有些出入。

劉:我有問題,你和張姐有沒有一個時候是,比如你對某樣事件有很強烈的想法,一定要這樣,而她一定 覺得不是這樣?

曾:作為一名新導演,會想我寫的劇本得到她的承認。雖然她願意接演,但我不知道她是否因為關於霓虹燈的題材,或者是否出於想幫新導演,我知道,這確實佔一定比重,但始終會期望你做的創作能夠得到她的認同。有一晚我們 message 對話,她的回應是:你放心吧,我的崗位就是演員。她很清楚這個界線,知道你不想被干涉,所以有時她會提出想法,但劃好了界線,然後退回一步。

林森:「我覺得《白日青春》前半是非常好,我喜歡你ending的處理,大家不知道要前往哪個方向,大家香港人都是這個狀況。很佩服你選這個題材。 在香港這個地方, 試問誰會 give a shit to southern-asia immigrant。」

劉:我自己就不是那種「我有一樣東西,大家幫我去成就畫面」的導演,我比較想創造一個情景,然後放一些演員進去,然後我捕捉他們,可能來自我拍紀錄片的經驗。所以,我在現場是沒那麼緊張的,真正講故事的階段在於剪接,我是最信任剪接的。黃秋生難不難找?不難,而且打開 60 歲左右的男演員名單,其實有九成九我都請不動,所以其實只有幾個選擇,他就是我的 Top 2。

端:可不可以透露 Top 1 是誰? 劉:我不說得,哈哈。

林:你再飲一杯先,現在飲得不夠多。我這些飲得夠多,就是負責灌醉你。我覺得《白日青春》前半是非常好,我喜歡你ending的處理,大家不知道要前往哪個方向,大家香港人都是這個狀況。但我是有一點picky的,我覺得你將南亞裔家庭的狀況處理得太好了,顯得黃秋生(陳白日)的部分不好,對不起。

劉:明呀,我明白呀。

林:我要去什麼地方,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,我 get 到你有這個訊息。但一有秋生,真心話,真是真心話,我進入不到。但因為我也拍過少數族裔(林森曾執導短片《暉仔》),那個部分是不容易處理的。

何:不是你的錯,大家都溝通不到。

林:你一定知啦,因為你是我畢業作品《暉仔》的副導演,大家飲杯先。 劉:好,飲杯先。

林:對不起,但我對你是 looking for more,很佩服你會選這個題材。在香港這個地方,試問誰會 give a shit to southern-asia immigrant。

劉:對我來說,你是我前輩。 林:屌你啦。

劉國瑞:「我們真是要致敬香港的編劇,香港過去都沒重視過編劇。只有做過編劇的人,才知道裡面是有多辛苦。」

林森:「全香港的編劇都真是好撚辛苦。」

賈勝楓:「香港編劇的待遇、地位都有問題,其實現在最不缺新導演,反而

缺一個培育編劇的system。」



林森與劉國瑞。攝:林振東/端傳媒

劉:講少少題外話,其實第一套令我有感覺的香港短片,就是《流放地》(郭臻執導,鍾柱鋒編劇),後來有試過找阿鋒寫劇本,但他不習慣去改編······

林:阿鋒是很奇怪的(鍾柱鋒為《窄路微塵》編劇),今次明明入圍金像獎,他說不出席,我說,我大老遠都從英國回來,那麼難得,為何不一齊呢?但他就是不喜歡這些場合。

劉:他肯做兩次訪問已經好難得喇。以前我和他都住長沙灣,但我都只是見過他兩遍。

林:哈哈 you know him!他真是一個奇人,完全不會 care 獎項。這一點是我最 respect 的。

劉:說到這裡,我們真是要致敬香港的編劇,永遠所有人都是訪問導演,但我覺得,香港過去都沒重視過編劇,說算任俠組織了編劇權益聯盟,其實都沒人理會他。只有做過編劇的人,才知道裡面是有多辛苦。

林:全香港的編劇都真是好撚辛苦。 劉:好似食屎一樣,我們都做過編劇啦。

賈:以前香港電影,可能最不受重視的那部分就是劇本。誇張到你根本一粒字都未寫,可能只是說一句, 警匪片、王家衛,其實就已經賣到,《阿飛正傳》就是這樣。

曾:一定是演員優先。譬如你有張國榮,你不用劇本,就已經找到人投資。因為是很容易賺錢。

賈:但現在不同,人家還是會問你,你這個故事講什麼?就算你有 Sammi (鄭秀文) 願意拍,都賣不出去。

曾:有 Mirror 可能會好一點?

賈:香港電影最大的問題,都是大家不重視編劇,不是說沒有好的劇本,沒有好的編劇,而是在這個 system 做編劇的待遇、地位都有問題,無法吸引更多有才華的人進入。其實現在我們最不缺的就是新導演,反而缺的是好劇本,還有一個可以培育編劇,不停產出好劇本的 system。

曾:所以我會想由編劇轉為做導演,就是覺得只有這樣才有辦法如實將自己想講的故事拍成電影,好與不好都是其次,但起碼是根據自己的原意,去處理自己的故事。

劉國瑞:「最需要改的是誰呢?是監製。監製才是掌控著整個製作最重要的東西:資源和權力。」

卓:但我又試過很多次,因為我拍《年少日記》是關於學童輕生,有老闆問我:阿卓,你的故事是關於什

麼?但一講到輕生這兩個字,他們一是扮聽不到,一是很快就想轉個話題,那我都不好意思再問你出錢投資了。我自己心裡都明白,你講這個題材出來,誰肯給你拍?

劉:我覺得我們談的方向全錯了,你們說的都對,但最需要改的是誰呢?是監製。監製才是掌控著整個製作最重要的東西:資源和權力。導演想改劇本?可以呀,但最後是誰去花錢?是監製。當然,我們今日的電影項目大部分都是導演主導的,《白日青春》都是我自己寫出來,我自己再去找投資。但真正落實到製作,如何去給予編劇應有的權益、收入也好,其實是監製的問題。

端:其實《正義迴廊》的劇本又是怎樣開始呢?

何:開題者就當然是翁子光(《正義迴廊》監製),首先有個 real case,他之前拍了一套(《踏血尋梅》)有經驗,覺得就算賺不到錢,都至少有機會得獎。因為故事很複雜,所以要幾個編劇每人 mark 死一條故事線去寫。

林:但有件事我想自己先說,無論我們誰人,怎麼拿獎都好,《窄路微塵》又好,《正義迴廊》又好,都 已經是一件事。你明不明白我意思?

何:我明,任何一個拿獎都是好的。

林森:「我想說,新導演在香港可以拍到這些題材,真的不容易。大家經常都說我們之間有競爭,我們不是要競爭什麼,我們不用靠你們(老一輩)那一套,我們自己有我們年代的definition。你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會怎樣,去吧!我們不要想這麼多。」

劉:拿不拿獎不是我們控制的,不過大家看到新導演是真的可以帶給香港觀眾,不只一部作品,而是一批,這件事很重要。

林:我想說,新導演在香港可以拍到這些題材,不容易,真的不容易。無論是《正義迴廊》還是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,《燈火闌珊》、《流水落花》、《白日青春》,我們這些題材真的不容易,但是,Once someone notice something······

劉:慢著,他手上那杯是否威士忌?那麼大杯?

林:飲啦。我想說的是,大家經常都說我們之間有競爭,競爭你老味 (競爭你個頭) 。我們不是要競爭什

麼,而是我們真是忍燃咗你們這些老屎忽好耐喇(真是忍了你們這些老屁股好久)!不用靠你們那一套,我們自己define我們那一套,這個年代就是不想要你們的東西。我們自己有我們年代的definition。你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會怎樣,但我們有嘗試在我們的範圍內,盡量做。去吧!我們不要想這麼多。

劉:什麼叫我們的範圍?我們就是範圍! 林:香港電影不應該再那麼守舊。

端:你覺得香港電影最守舊的地方是?

林:最守舊的是,一切都要論資排輩。有些事情,你覺得好,那它就是好。

卓:我覺得沒分對與錯,只不過是創作內容上,上一代香港電影很多警匪片,但我們是完全沒有意欲拍警匪片的,整個世界都已經不同了。我們這幾個人,拍第一部作品的主題,初看就知道不是那些「收硬」(必定會賺錢)的,但我們就是要拍。《正義迴廊》一開始都無人覺得「收硬」。

林:但是不是要有些 dignity 是屬於我們?我們可不可以 stand 到這件事,不用理會那麼多市場。做自己 囉。

林森:「(香港電影)最守舊的是,一切都要論資排輩。有些事情,你覺得好,那它就是好。」

卓亦謙:「上一代香港電影很多警匪片,但我們是完全沒有意欲拍警匪片的,整個世界都已經不同了。」





何爵天與林森。攝:林振東/端傳媒

PART 2.5: 秋生、阿蘇與Sammi

林森已醉倒,先行離席。而且手舞足蹈之間,把最後小半瓶泰斯卡都倒瀉了。

劉:剛才的問題,我們好像還沒答完。 端:那直接問你吧,黃秋生是一個很難駕馭的演員嗎?

劉:拍攝的時候一定覺得辛苦呀,但秋生也是個很 reasonable 的人,只要你去說服他,而你能夠說服他,他是可以給你一些東西。

何:那你有沒有無法說服的情況?

劉:緊係大把啦。而且我是很容易去妥協的人,但我覺得我的妥協不是因為我放棄了屬於我的東西。如果一個角色,或者演員本人是這樣,我不會不接受,我不會用某一個標準去 judge 別人,但我拍一套香港電影,在香港這個社會框架下,香港人會 judge 我,不過我不會 care,當我被人攻擊、質疑的時候,像林森所說,I don't give a shit。

還是回到秋生的問題,跟他合作,首先你要有很強的理念去說服他為什麼要這樣做,他能夠為我的劇本打開另一個空間,最後其實也是幫了我。創作期間,我是有和他溝通過,不是完全任由他發揮。

記得有一次,某個場口我覺得很重要,他演繹的情感是跟我想像中有很大出入,然後我叫停整個 crew 跟 他繼續談,說我怎樣理解這場戲,說到我自己都忍不住哭。那個 moment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,是說 陳白日離開了哈山,觀眾都會知道他心裡仍然有這個小朋友,就算沒一句對白有提及這件事,但我們感覺 到的。

劉國瑞:「跟秋生合作,首先你要有很強的理念去說服他為什麼要這樣做,他能夠為我的劇本打開另一個空間,最後其實也是幫了我。創作期間,我是

有和他溝通過,不是完全任由他發揮。」

端:他最後願意接納你那一套想法嗎?

劉:他這個人是鐵漢柔情的,如果你和他撐,他是會和你撐到底的,但你和他講心,其實他反而會理解你的。在我說完以後,談了二十幾分鐘,準備開機,然後他突然說:等等,導演,我明白了,然後他又和我講了很久他是怎樣去理解故事。不過,他回去再演一遍,其實我是覺得沒有什麼不同。或者只是一點點,我覺得不明顯。但至少在那一刻,我明白這個演員和導演在創作期間,我們建立了一些默契。

你是要有這樣的溝通,這部戲才會成立。但我覺得真的好難,當然我一開始的想像不是這樣,我是一個比較抑鬱、安靜的人,對於這個父親的想像也不是這樣。

端:《正義迴廊》和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的情況有何不同?

何:《正義迴廊》是我第一部戲,好在大家都很合作,除了林海峰是相對難一點溝通的,這方面大家都明白。反而阿蘇(蘇玉華),她一向做舞台劇,我們以為她拍了很多電影,但其實這是她真真正正拍的第一部電影,因為她以前那些,即是高志森那些,都是做完舞台劇然後「變成」電影的。從 2000 年後,《正義迴廊》是阿蘇第四部電影,前面那三部都是一些客串角色,main role是第一次。

拍的時候沒什麼,但在看的時候她很驚訝,問為什麼會剪接成這樣,我是感覺到她很不開心。因為舞台劇只要排了多少就有多少,而且拍電視劇都不會剪走那麼多。舞台是演員主導,電視就是編劇主導,電影呢,就是導演主導。她是慢慢才發現到這三者的不同,當然,現在有金像獎提名,她就更開心了。

到第二部《死屍》,反而輪到我就有點緊張,因為要對著Mo姐(毛舜筠)和鄭中基。始終都是泰斗級的演員,Mo姐當然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,做喜劇是她最拿手的事情,其實我很怕有些演員是——因為我有聽講過一些演員是希望攝影機永遠對著自己,可以dominate整個作品,但Mo姐不是。

何爵天:「拍《死屍》時我有點緊張,因為要對著Mo姐(毛舜筠)和鄭中基。始終都是泰斗級的演員,Mo姐當然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,做喜劇是她最拿手的事情。我有聽講過一些演員是希望攝影機永遠對著自己,可以dominate整個作品,但Mo姐不是。」

賈:雖然 Sammi 本身很喜歡劇本,但未到片場,永遠都不知道演員的本性是什麼,都一定會擔心她心裡

是否已經有一套很確切的想法?如果到時我覺得不應該這樣,我要怎樣說服她呢?特別是這些都是很資深的演員,她已經跟一些知名導演合作過那麼多遍,比起我,她見識過的世界太多了,那我怎麼辦呢?怎樣說服她呢?是一定很尷尬。

但我覺得 Sammi 和我想像中是相反的,有時我會說我不想這樣,我想要 energy 低一點。就算任何時候,她都會以我為準。這部作品是比較內斂,很多東西不是要講出口,這樣你是需要去 feel the most show the least。我想她很 enjoy 這種方法,我不知道張姐、Mo 姐是不是這樣,原來我以為最有壓力的那個人,是最令我安心的人。

那麼其他壓力就來了,因為我在片場實際經驗很少,反而要面對 production 的其他問題,對一名新導演來說,不夠時間原來才是對我最大的挑戰。

賈勝楓:「Sammi 和我想像中是相反的,就算任何時候,她都會以我為準。這部作品是比較內斂,需要去 feel the most show the least。我想她很 enjoy 這種方法,原來我以為最有壓力的那個人,是最令我安心的人。」





《白日青春》導演劉國瑞。攝:林振東/端傳媒

Part 3: 社媒世代的導演: 謝票場

趁六人中之謝票王何爵天還在場,先問問「謝票」——這今日香港獨有的觀影文化,即新片上映後,許多場次電影完畢,會有導演與主創人員現身,親身感謝入場觀眾及解答問題。社媒時代,原來導演是自己作品的PR/公關?

端:如今做導演再不是幕後崗位,有時都要兼顧「幕前」演出,因為香港電影近年都流行以謝票場作為宣傳。你們如何看待導演崗位的轉變?

何:首先我已經謝票謝到有「偶包」了。

卓:謝票文化,真的算是香港獨有。是香港地方那麼小才做到。

劉:但其實為什麼我們要讓觀眾知道那麼多東西?因為這是一個 social media 的年代,有時我會覺得暴露這麼多自己,是一件很危險的事,沒有留空間給觀眾去想像電影的世界是怎樣。

賈:作品本身就是它的全部。 劉:對呀,導演內心到底在想什麼,其實又關你什麼事?

何:坦白講,其實我們花在謝票的時間,都夠每個人拍多一部戲。如果是邱禮濤,拍兩、三套都得。我真的謝票謝了半年,《正義迴廊》由去年八月開始,我打算休息、去旅行,原來不行,接下來又有一部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。是開心,但又覺得有些東西困住了自己。

開心在於,像你在舞台劇,演完一部戲出來謝幕,大家對你拍手——如果覺得好看的話,當然都有人會批評你。我發現兩部戲的謝票反應很不同,《正義迴廊》會有很多人有很多問題想要問你,《死屍》是入去搞氣氛的。對宣傳來說,我知道這是很有用的,傳統的事(廣告)要做,但傳統的做法對某些作品未必有用,當我們揼石仔(一步一步完成)時,無錢就唯有用我們的時間,就是你去瞓身(全身投入),做得愈多,令social media有些事情在發生,叫做佔領版面。我們其實就是找些東西來做。最初不知道有無效,但你不做就過不到自己那一關。

劉:他是第一,你都接近第二啦。哈哈。

何爵天:「無錢就唯有用我們的時間,就是你去全身投入,做得愈多,令 social media有些事發生,叫做佔領版面。我們其實就是找些東西來做。 時代不同了,都是要學習的,有些老影評人笑你去謝票,我才廢事聽他們 說。」

何:其實謝票和不謝票,效果是相差很遠的,不是說你來謝票,吸引到觀眾買票,都起碼多了一份誠意,而且,你出來謝票,一百個觀眾裡面有十個人打卡放上網,你都已經多了十個免費廣告。我現在連打開 IG 見到有人出 Post 都要網上謝票。

賈:但我覺得不同電影有不同 style,有些是適合謝票,有些是可以不謝票。像一些新書出版,會有簽書會,但不是全部都有。我不抗拒去謝票,但我不希望變成,有謝票會增加票房,不謝票會減低票房,最好不要變成一個 must,變成票房的一部分。跟觀眾見面,當然可以分享多一些,接近多一些,這取決於導

演的性格。

何:你永遠不會知道兩者的關係,如果我不去謝票,有沒有這樣的票房呢?

賈:然後到時又會後悔不出來謝票。 何:你不想掛勾,但其實又真是掛勾。

劉:我又真的不肯定是否掛勾。《白日青春》剛剛上映,我都謝了一個星期。攰(累)呀,當然覺得攰

啦,我只有自己一個人,而且我要答觀眾很多問題呀,是勁多(超多)問題。

何:就我的理解,沒演員一起謝票是差一截的,影相(拍照)都少一些。

劉:因為我是不喜歡答太多問題的。 何:用作品說話。

劉:是的,我是有意在電影裡留了空間讓觀眾解讀,但你問我,我又要答問題。我自己經歷了一個星期, 試過有一場我們遲到,戲已經播完,職員叫觀眾留下來,他們是真的坐在戲院等我。我入去以後,其實已 經沒時間,要散場了,但他們又跟我在外面談了很久。

那一刻我意識到,觀眾真的有很多問題,不是他們有心刁難你,是他們真的不明白,很想知道更多。我會覺得這些交流是有意義的,就算我再三強調這些是我的想法,絕對可以有其他想像空間,但原來我提供的extra information會令他們對作品及這個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。當然,都有人專程challenge你的,這不用講。

曾:我是從優先場便開始去謝票,有時都會覺得,其實我在做什麼呢?原來我不只是導演……

賈: 導演都要做 PR (公關) 呀。

曾:有少少覺得,自己是不是變成電影知客呢?要負責接客、送客。但又很想將觀眾留在戲院,因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才能告訴觀眾,你進戲院跟家裡screening的分別。即使很辛苦,但又好像有價值。除了有現場的溝通,直接地聽到他們的詳細意見,也是透過電影連結了你和觀眾,跟以前拍完一部作品就完結的單向關係很不一樣。



《燈火闌珊》導演曾憲寧。攝:林振東/端傳媒

曾憲寧:「有少少覺得自己是不是變成電影知客呢?要負責接客、送客。但 又很想將觀眾留在戲院,因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才能告訴觀眾,你進戲 院跟家裡screening的分別。即使很辛苦,但又好像有價值。」

最初我是覺得沒什麼好說的,我要說的都已經全部在作品裡,但當有人問起,而你知道別人會這樣問,你就開始發覺原來可以愈講愈多,又或者有些原來你也沒發現,是透過講述或回答的過程你才知道。可能是種反芻,或是總結的練習。我覺得這個關係也挺美麗。

何:事實上,有時觀眾提出的許多見解,會超乎你本身的想像。例如有人看完《正義迴廊》之後,真的看了關於希特拉和哲學的書,又有人會問你,最後的畫面有些蜘蛛絲,是什麼意思?是否暗示三千煩惱絲呀?我很喜歡他們這些解讀。

賈:所以我最enjoy是這一部分,是得到他們的很多反應,反而不是謝票。

何:以前做導演可能只是接觸到(票房)數字,但始終觀眾就是人,你的作品最後也是要接觸人,喜不喜歡都要面對群眾,不能只是打飛機,對你的下一部作品都有很大幫助。當然,自己要懂得衡量,不應該是觀眾喜歡看些什麼,你就拍些什麼去please他們。

傾談至此,何爵天要趕去《死屍死時四十四》謝票場,先行離開。

Part 4:講錢傷感情,而且還要趕時間

夜更深了,酒未盡,大家講到「錢」。桌上杯碟分外凌亂。

劉國瑞:「我覺得在這一代,永遠都不可能憑著做導演發達富貴,這跟以前不同。甚至乎我付出的東西,是多過我的回報十多倍或幾百倍的。所以,要付出那麼多,你的作品就一定是想說跟自己生命有關的議題。」

端:本地作品再次湧現,甚至帶動了社會話題。能夠稱得上是下一個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?

曾:我覺得不是。 卓:至少我完全看不到黃金在哪裡。

雖然《白日青春》我拍難民故事,我不是難民,但裡面很多情感,都是源自自己在香港十幾年的感受,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是。你是想透過電影去解決一些事情,觀眾未必會 buy 你那一套,但首先有一個很強的 motivation 去做這件事,其次才是去訓練我們的技術。

以前是講電影技術的年代,即是像鄭保瑞這樣,他是中學畢業就去片場,或者大部份人都是,在電影訓練的過程裡找到自己想說的東西,甚至有些是根本沒有自己想說的東西。而我們的過程是相反的,我們是有想要表達的事情,所以我們才拿到錢。拿到錢之後我們才想辦法把它做出來。我也想知道,你們覺得最後出來的製作成果,距離本身理想有多少分呢?

賈:我覺得70分左右,你呢?

劉:或者我對於一些資源調配的控制不夠好,我覺得是 65 到 70 分。我最大的掣肘都是時間,因為我那時候只有 20 天去拍攝,我在 12 號煞科,13 號黃秋生就要飛台灣。所以是連一天後備都沒有,也完全沒有改動的空間。我想試一些很特別的 camera movement,但你要試這些東西,是需要時間。我最大的敵人就是時間,因為有錢都買不到時間。應該說,錢根本是時間,但我的錢又不夠買那些時間。

賈:有時不夠時間就是不夠時間,你想了再多也沒有用,譬如本身我準備了十組鏡頭,第一組鏡頭已經超出了自己預期,第二到第十個鏡頭你都要取捨。我相信所有導演準備得再好,都一定會遇到這樣的情況。

曾:除非你說 pre-poduction 是可以用很荷里活的方法,真的有全體演員一起去排戲,練走位、台詞位、 鏡位。但我只有圍讀那一天才齊人,連圍讀的時間都不夠。

卓:你講到 pre-production,我面對的問題是,我只夠時間做一個月 pre-production,連 casting 都要取捨。很多角色我都想透過 casting 物色。但最後沒辦法,而且又要排戲,時間只有這麼多。都是經過這一次才知道,原來 pre-production 都要花很多錢,例如你排戲、場地的錢,要演員圍讀都要付錢。

劉:所以你們其實應該學我,找一些素人演員就比較易搞。你要圍讀十天,他們真的可以讀十天。

曾:所以你小童演員那一部份是有些優勢。但另一個問題是,我的演員是近乎沒收片酬,在沒有收錢的情況下你很難再要求對方給你額外時間。人家還要已經為了你在防疫酒店隔離了兩個星期。

賈:本身用來拍攝的資金已經不夠,還有很多新導演預計不到的問題,又何來多餘的錢做 pre-production?

卓亦謙:「我的看法是,其實整個香港,沒有獨立和商業電影之分。我們都是拍獨立電影。因為我們本身沒有工業,沒有制度。」

劉:這說法有些歪了,問題是導演在現場,就算我排練了幾百次,現場覺得不夠好,我就是要拍。為什麼我一定要跟我原先計劃去拍?這才是拍電影的意義。就算它 100% 按照我的計劃,我作為導演就是不開心。為什麼會這麼順利?一定有些東西不對勁,我當然要重拍,有什麼問題?我沒有 baseline,我一定要拍到我爽為止。

現場不會 feel 到有些東西是錯嗎?一定有東西錯,那個 feel 才是對的,如果不是跟 feel 拍,你怎樣去做 導演?這樣拍電影不可以嗎?前提是我的 producer 不過來 stop 我,我怎樣拍都可以。拍電影的意義就 是導演拍到爽,導演是神,導演想的東西一定是對,導演在現場感覺到的東西才是對的。

賈:理性一點去講,不按原先計劃去拍,最主要是因為現場有很多變化。如果所有東西都能跟足事前準備,其實你找 ChatGPT 做導演都可以。





《流水落花》導演賈勝楓。攝:林振東/端傳媒

卓:我的看法是,其實整個香港,沒有獨立和商業電影之分。我們都是拍獨立電影。因為我們本身沒有工業,沒有制度。外國就有。舉個例子,Mike Mills 拍的 Beginners(《基爸愛留情》)是一部沒大型 studio 支持的獨立作品,他的預算是 3000 萬港幣。對他來說,這個規模是獨立電影。

都見過一些大型的片商,說是開一部電影試一試新導演,都有五十、六十組戲,這就是分別,我們哪有可能有六十組?太奢侈了。所以你問我,在香港拍電影幾時都是用很少的資源試出來。

劉:我就不會問為什麼我不像人家可以有六十組,我會問為什麼我無本事五十組內拍完。

賈:相比之下,香港首部劇情片最多就二十三、四組吧,這已經算很奢侈。

卓:為什麼大家要在十幾組戲拍完一部作品,就是因為不想行內有那麼多剝削。

曾:沒有專業的 crew 是願意完全不收錢來幫你拍戲的。 賈:都未必有人願意給我們剝削。

卓亦謙:「其實我差一點有想過去財務公司借錢拍戲。」

劉:講真,你拍劇情長片,是一定要有基本資金。再低成本都是要錢。我聽說低極都要幾十萬,《夜香. 鴛鴦.深水埗》都要幾十萬。「首部劇情片」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,雖然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拿得到。 但第一部電影就有政府給錢,第二部又是因為什麼呢?要去想自己怎樣長遠地去發展自己的事業。

現在是因為形勢變了,沒有合拍片了,然後電影公司抽回一些資金在香港本土市場,但是又不可以給到一千多萬開一部戲,就是開給新導演那三、四百萬。是一定有機會給新導演的,但是又視乎他們肯不肯繼續用三、四百萬拍第二部。

曾:而且條例上不容許再加任何錢,《燈火闌珊》的 funding 只有 550 萬,打爆都只有 550 萬,就算你找到再多再強的投資者,我都不可以融資。

卓:香港市面上,創作自由度最大的確是「首部劇情片」,但我要重申一件事,它的資金不是多,《年少日記》只有 325 萬。她說得對,條例上不容許再融資,要不就是我自己暗啞底洗錢,用我的積蓄。但我的積蓄有限。其實我差一點有想過去財務公司借錢拍戲。剛才講到 producer,我的 case 更特別,我的 producer 是爾冬陞。爾冬陞對於處理「首部劇情片」和另外一些要直接問老闆拿錢的項目,態度完全不同。

沒錯,因為我的錢不是他找來的,他就由得我,由前期到拍完他只是出現了三次。因為他覺得,你只有三百多萬,這麼少錢,即管試一試吧。但這樣對我來說都有好處,我聽說另一部戲由他監製,是問古天樂拿錢,他插手得很嚴重。所以我覺得,就算你可以問老闆拿多些錢拍,但你又要面對監製會插手多一些。

劉:所以,未來我想自己做自己的 producer。因為這樣我才能控制我的資源。他們三個跟我不同,他們都是「首部」,其實自己就是半個老闆,我不是。《白日青春》是商業投資,我是另外有 producer 的,我不能夠分配資源,當人家跟我說,這樣會做不到,我無法反駁為什麼做不到。因為 producer 才是花錢的人,現在我做導演,簽支票都不用經我。

當然我們會有完全 no budget 的拍攝方式,全部 crew 都是搭膊頭找朋友。我拍過啦,在香港拍短片誰不是這樣開始。不用錢就最自由,但如果我們想要多一點東西,我便要自己控制預算,即使只牽涉到十元,我都要考慮這十元怎樣分配。但其實我們可不可以不再說錢,有沒有下一條問題。

PART 5:加入制度,改變制度?

午夜已近,九龍燈火。關鍵的話題來了……眾人立場不一,杯盞未冷,火藥味重起來。

卓亦謙:我覺得起碼有一些自己人在裡面是很重要的,今日有「首部劇情片」,都是莊文強進入建制後爭取回來。雖然我不能夠這樣去評論,我也不能夠去估計,我明白,什麼都有機會發生,人性很容易被權力腐化,但我不能放棄如此去希望。

端:憑著首部電影出道之後,有沒想過走入建制,或者可以改變守舊的電影工業?

賈:我沒有。都是那句,我最關心的是我怎樣可以拍好作品。

曾:我只是想「說好自己的故事」。對我來說,創作自由是最首要。若感覺到因為你在某一些崗位而有一個框,有一個外力令創作自由受限制,我就會覺得很痛苦。或者是要你朝著某一個方向去做,這就不是創作,而是廣告。

劉:但講到加入建制,不是說它如何影響你去拍一個作品,因為加入建制,不只是影響你拍戲,而是你有份影響到其他人拍戲,在這個工業裡,你是有審批權,你是可以定義哪些電影有資格,可以拿到多少資金。

卓:但我不反對······你們是不是在講 Eric(《過時.過節》導演曾慶宏)?因為我覺得建制都要有個自己人,只不過我不會這樣做,我沒有考慮。但有業界的人在體制裡面是很重要的,如果連 Eric 都不做的話,他們裡面就會全部都是馬逢國這樣的人。在這個情況下,我們和整個工業的距離就會更遠。

我覺得起碼有一些自己人在裡面是很重要的,今日有「首部劇情片」,都是莊文強進入建制後爭取回來。 雖然我不能夠這樣去評論,我也不能夠去估計,我明白,什麼都有機會發生,人性很容易被權力腐化,但 我不能放棄如此去希望。

賈:你這樣講我就同意,就是可以幫助到下游的人。如果有權,是可以批錢給其他導演拍片,支持認為是好的電影,我何樂而不為去做這個崗位?

曾:我應該是不會去做這個選擇。 劉:以我認識的你,都應該不會。

曾:我覺得總是有條件交換的,而剛才其實我答了,我對於創作自由的尊重,會令我覺得盡量不願意接受 這些身份。

劉:所以首先就不想 make a deal。在我而言,如果是有錢銀的來往,就會覺得不要找我了。我首先是一個想財政上比較簡單的人,我不想有太多不明不白的錢銀來往。不過,都要看具體是什麼崗位,如果是一些評審性質的東西,就有機會的。

曾憲寧:我覺得總是有條件交換的,而剛才其實我答了,我對於創作自由的 尊重,會令我覺得盡量不願意接受這些身份。

賈:但這樣想就太多前設了。如果有一個這樣的位置,你可以幫助一些同世代的電影工業,或者新導演, 我覺得是值得做的。至於有什麼條件交換,人性會不會變得腐化,你自己會不會站得穩,都有很多可能性 在裡面。

卓:其實那時我們「首部劇情片」的幾個評審,起碼就有游乃海,有張婉婷,他們是知道怎樣去評論一個劇本好不好的人。莊文強發起「首部」時就有講明,審劇本的人一定要懂得看戲。不可以找個不知什麼官員去決定,要有業界的人在裡面,人數起碼一半。他是很接近權力核心,但他叫做為下一代保障了一些東西。我覺得,劇本是有技術標準。起碼要識得分小說和劇本有分別,會看那場戲有什麼潛台詞,會看個別單一場,再看整體意念、設計,會分析這個人究竟他寫的故事,符不符合所謂入流的劇本標準。

賈:對,總會好過被一些外行人去 judge。阿卓說得對,如果全部人一心服務建制,其實就更危險了吧? 起碼有些人是有心,會去為了整個業界著想,這都是一種對抗老屎忽的手段。

劉:我認同你的說法。但大家都知道,代表建制會面對一個什麼環境。我只可以說,你賈勝楓今日覺得值得一試。站在我個人的角度,我寧願打外國戰線,我會試台灣、韓國、東南亞,我都不想花時間 deal with 香港內部制度。哎,所以我贏不到(首部劇情片)囉。

PART 6:新導演想拍合拍片?

夜盡闌珊,人影燈影鬼影。紅線如何攔路,人如何認路,抑或迷路。杯中酒且盡,未來五年十年——各人兩套三套作品之後,自有那時的世界。而那個「未來」之本來的面目,就在今夜?

劉國瑞:「只要是我想拍的作品,資金從哪裡來我沒所謂,問題是它是否容許我有100%創作自由。如果無,給我五億我也沒有用。」

端:你們抗拒大陸資金嗎?

賈:今日幾乎都沒有合拍片了,有的只是引進片。當然,我們所有片都有機會引進回大陸市場。

劉:我想問合拍片是不是一定指大陸合作?如果是我的下一部作品,我不想在香港拍,也不想在中國大陸拍,我是想在馬來西亞拍電影。首先,只要是我想拍的作品,資金從哪裡來我沒所謂,問題是它是否容許我有 100% 創作自由。如果無,給我五億我也沒有用。因為你一定要過審,那就一定要斬很多刀。而且時代有些不同,今日不再是 2017、2018 年,反修例之後,合拍片背後的意義完全變了質,作品上不上到是一回事,但我不想浪費我的生命去過審。我寧願在美國拉多些錢,去韓國拉多些錢。

賈:我覺得它背了很多東西。 劉:它是誰?

賈:合拍片這個名目。它背了很多打包一定要做的事,譬如說它一定是干預自由,一定是你劇本上要大刀 闊斧地斬。

端:你覺得《流水落花》如果改以合拍片的形底,會剪幾刀?

劉:首先女主角不可以死,一定可以醫得好。陸駿光出軌是可以,但他要坐牢。

曾:然後改過自身,做回一個好人。 劉:還要跟女主角生多兩件。

賈:差這麼遠,當然不想啦。拍電影最 first priority 是想拍到一部自己覺得好的作品,如果拍出來的都不是自己最想要的,但你拍電影也沒意思。

劉國瑞:「我們真是有得選擇嗎?」 賈勝楓:「我依然覺得我有選擇。」

卓:其實,很多年前我真的想過回去做合拍片,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《封神榜》,我經常想拍一個 version 是說真正的紂王是一個好人,只不過他打輸了仗,於是他被歷史改寫成一個壞人。但現在大陸又 不准改寫歷史了。

劉: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值得拍呀,可能有機會過審。 曾:我想不會,似是覺得你含沙射影。

卓:我現在不會再想啦。

劉:不是呀,你是爾冬陞你一定過到,他那部是否叫《海的盡頭是草原》,過到審呀。

卓:是林超賢、劉偉強、徐克就得囉。

賈:好像以前明朝科舉的八股文。其實他們都可以寫到好文章,但那些都是被迫的。如果我們有選擇的時候,我們不需要選擇寫這些東西。張藝謀沒有選擇,他一定要在大陸體制裡創作,當然,他同樣可以扭到、拍到一些出色的作品,但我們本身不用,我們有得選擇。



香港年輕導演: 賈勝楓、卓亦謙、曾憲寧、何爵天與劉國瑞。攝:林振東/端傳媒

劉:我們真是有得選擇嗎? 賈:我依然覺得我有選擇。

劉:我就有個理想,我想拍一部馬來西亞題材的電影,資金上最好台灣就給 30%,韓國 30%,我在香港 又拿 30% 商業投資,但我不想拿香港政府的錢。最後在新加坡又拿 10%,對我來說這是無得輸的方案。

曾:但韓國為什麽要投資給你?

劉:因為我有才華。韓國政府有支持很多 co-production,那筆資金是否給我就不知道。但我一直在嘗試,不希望任何一方的資金比例太多,這就可以平衡勢力,最終揸fit(抓主意)人仍然是我。你給我的條件太難,我隨時可以踢走你。我未必一定要拍香港電影,但如果在海外拍到兩三套,讓我熟習了這樣的模式,At the end,我可以將它帶回香港。

曾:你說的那種,我覺得很理想,亦很值得嘗試,不過這個模式又可能有其他問題。未必是限制,你反而要面對更多方面的投資者意見,準備時間會拉長,或者更會影響你的創作。

劉:但當最大的那樣東西,即是創作權,掌握在自己手上有,當然,這是我的理想。我覺得下一部電影真的未必做到。

賈:不過跟你相反,我也很想盡可能籌集到多方資金,但我想的不是令我話事權大一點,反而是想多點學 習不同國家的模式。

劉:但我覺得沒有東西要學。我不是指導演技巧上,而是要告訴別人我為什麼這麼特別,不是我請求他們來投資我,是他們想要加入我。

賈:有機會去到不同國家,例如學習美國那邊的工業模式,他們可以教我怎樣將拍電影變得體制化一點。

劉:所以你是想嘗試的。其實你最終就是會走入體制的那種人,但我就是不想。

曾:不是這個意思,他只是用錯 term,他是想我們變得再有系統一點,或者是減少剝削。

賈:剛才就說我們資金有限,會變成剝削。但如果這是一個比較有 system 的行業,大家應該要有一套公平的方法去做電影。

劉:我自己就真的沒想到那麼大。因為我自己覺得,我本身在這個行業都被人歧視,為什麼要幫這個工業 想那麼多東西?所以,對於我來說,我不用去想怎樣去幫這個系統,我對我的創作團隊好就可以了。

賈:但你對團隊好,譬如你跟他們計足 OT 錢,有固定開工時間,這都是一個待遇,是工業化的一部分。 或者你心裡不具這樣相。但你相做的事都會影響這個工業 劉國瑞:「如果覺得自己變了,不要覺得這件事是不對的,問題是你要知道自己變了。我有預感,香港有朝一日會發生非常重要的事,一夕之間就會改變,那個 moment 如果不身處香港,我會後悔。」

劉:但我經常覺得我是要跟大家有所不同的,因為我本身就跟大家不同,那種感覺是不會消失的。當然我們現在都是新導演,所以今晚才會約出來一起做訪問。

別人看來,這班人好像很齊心地做電影,因為我們正面對相似的問題,但再過兩、三套作品,五年、十年的時候,其實會見到一些不同,因為大家的想法、性格不同,有些人會妥協,有些人是不會,有些人會走,繼續對抗這個系統,但有些人會選擇在這個體制裡工作。但只要我們記得今晚,或者是你最初的那個模樣東西就行了。別人會覺得你今年變得和上年不同,但我變了關你撚事?

如果覺得自己變了,不要覺得這件事是不對的,問題是你要知道自己變了。其實這也是拍《白日青春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,我從小就經歷很多離別,由十幾歲到三十幾歲都看到很多人的改變,會覺得很可惜,但是也很珍惜我們真的很密切很接近的那幾年的時光。雖然都是華人社會,但馬來西亞沒這種強烈的集體認同,反而在香港住了十幾年,我是有的。其實 2020 年我是有機會離開,真的可以去美國發展,要決定那一刻才發現自己不捨得。

我有預感,香港有朝一日會發生非常重要的事,一夕之間就會改變,那個 moment 如果不身處香港,我會後悔。好似《陽光兔仔兵》最後一幕,大家出來慶祝,我不想錯過那一刻,其實留在香港都是想等那一刻。

場地鳴謝:上海街唐三樓